

CONGTONGZHIGONGTONGTI
DAOYIZHIGONGTONGTI

万高潮 魏明康 著

从同质共同体 到异质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华商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万高潮 魏明康 著

华商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林平
装帧设计 饶家仁

书 名 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作 者 万高潮 魏明康

出版发行 华商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尖沙嘴山林道 54 - 56 号利雅商业大厦

开 本 890 × 1240 字 数 26.33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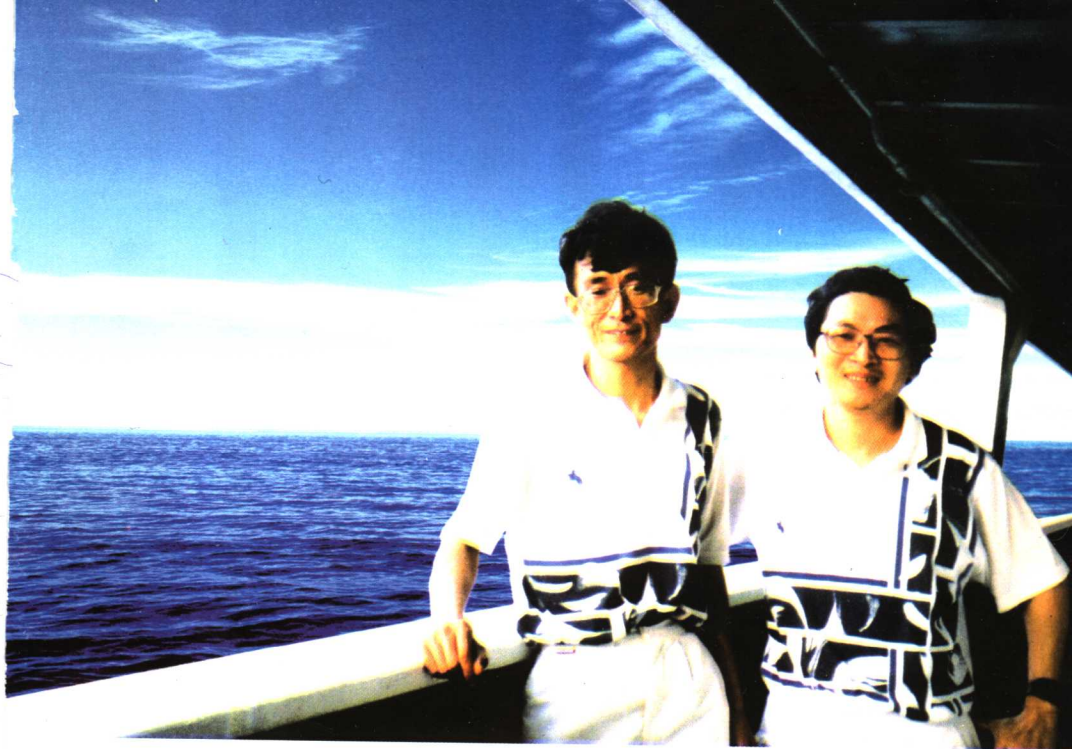
印 张 12.38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1 - 1700 册

书 号 ISBN 988 - 97104 - 2 - 0

定 价 港币 30.00 元 人民币 30.00 元



万高潮（右），男，江西南昌人，1956年生于湖南湘潭，1978年入湘潭大学哲学系，198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兼研究生院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著译有《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湖南出版社1997年）、《凯恩号哗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

魏明康（左），男，江苏南京人，1958年生于黑龙江“北大荒”，1978年入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1983年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先后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年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讲师，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译有《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等。

初版序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的主标题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副标题是“从同质共同体的追求到异质共同体的重建”。关于什么是政治发展，什么是政治稳定，什么是同质共同体，什么是异质共同体，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书中的正文都有展开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并不多说。

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我们想啰唆几句的，是关于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本书原来设想的主标题是“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原来的副标题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我们之所以总想突出同质共同体与异质共同体这一对概念，学术上讲，是因为就我们的阅读所及，这一对概念在政治学说史上似乎具有原创性。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写作此书，使用的是比较政治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毛泽东晚年对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追求，与邓小平对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作比较，以此来凸显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不同的意义。

书名这样设计的道理我们交待清楚了，但是这一书名在技术上也有它的不足，就是好像本书仅仅将晚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比

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

较。其实当然并不是如此。读者翻开目录即可明了，将晚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比较只是本书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而本书第一篇则专门讨论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生成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我们之所以安排此一篇，是为了强调，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与王明等等左倾政治路线的不懈斗争中，逐步确立了异质性社会共同体这个政治理念，而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是我们在今天也仍然不可低估的。实际上，只要不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我们就仍然可以通过探索毛泽东当年确立异质性社会共同体这个政治范式的历史过程，来为我们的国家在今天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吸取种种有益的政治思想资源。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尽管异质性社会共同体这个政治范式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初创的，但在他那里这一范式更多地具有的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惟其如此，进入晚年之后，他也就逐步放弃了在当代中国建设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努力。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刻反思，在战略上作出了重建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努力。而且在本书正文的讨论中我们还将看到，他实际上已经相当精彩地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性任务。而这，也就是我们衷心地愿意以这样一部学术性的著作，来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道理。

作 者

2003年12月26日

于北京能通

再版序

反思到 1952 年甚至以前

通常人们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反思都止于 1957 年，即认为此前他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还是“先进”的，错只错在经“三大改造”消灭了阶级之后，他仍然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我们不同意此种见解。通过提出同质共同体与异质共同体这样一对概念并以此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反思推及到了 1952 年甚至以前。由此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早在 1920 年代的建党时期，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一个纯粹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社会共同体。1930 年代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政治分歧，也仅仅在于王明之流愚蠢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可一役”，即要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就“打倒资本家”，就迫“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而毛泽东则策略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只能以“三座大山”为敌，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为友，而后一个阶段就将轮到前一个阶段的“朋友”成为革命对象了。

第二，自 1952 年底开始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了将自己

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

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为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社会共同体而付诸实施，毛泽东就必然而且必须一以贯之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无非这种“斗争”在1956年以前重在从经济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等“异己”，在1957年以后重在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等“异己”。所以，如果肯定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为同质性社会共同体仍然是“先进”的，如果肯定1956年以前毛泽东之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仍然是正确的，逻辑上我们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其实1957年以后毛泽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承认1957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逻辑上就必须同时承认他在1956年以前推行此一方针也是错误的，而他本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为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社会共同体就更是错误的。

第三，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以阶级合作的政治方针取代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在于他以重建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努力，否定了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为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所谓“先进”性。而这种取代与否定的实践意义是我们今天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君不见，时下不有人正在嘀嘀咕咕：如果说毛泽东当年在消灭了阶级之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那么现在阶级已经重新出现了却还不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岂不也是同样错误的？！

作者

2004年8月22日

小平百年诞辰于北京能通

目 录

初版序	写在前面的话	(1)
再版序	反思到 1952 年甚至以前	(1)

第一篇 毛泽东与异质性社会共同体

第一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生成及其 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意义 (一)	(3)
-----	---	-------

本书所谓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是指由既拥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又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多个利益集团组成的同一个共同体：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才有必要建立某种政治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又是因为它们所拥有的根本利益相同，所以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的政治机制来合法地、和平地、相互妥协地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

冲突，并且也才有可能在这种民主的利益协调过程当中，维持住共同体内部的积极的政治稳定。实际上，回顾毛泽东漫长的政治生涯，大约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自中共建国至1952年中这几个历史时期，亦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他本人就基本上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把握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及其与异质性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的。

第二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生成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意义（二）
..... (24)

既然已经认定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那么不言而喻，不仅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即农民与城市手工业者，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同是新中国社会共同体的当然成员。他们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不应该是四个敌人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而应该是“四个朋友”之间互助互让的阶级合作关系。那么在此基础上可能建立的，又当是何种政治体制呢？在中共建国以前，“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对此

毛泽东的答复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的制度”，而只能，因此就应该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第二篇 毛泽东与同质性社会共同体

第三章 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影响（一）

..... (43)

本来早在中共建国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向全党指明：“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中共建国之时，毛泽东也的确是“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然而到了1953年，他居然又把早已由他本人回答了的老问题，作为一个新的尚待回答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他认为“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于是他不顾自己在中共建国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再次发问：“难道可以说既不走

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显而易见，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认为，新中国确实可以而且完全应该走一条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认为只能在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他所想像的资本主义模式之间作一种二中择一的排斥性选择了。

第四章 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影响（二）

..... (64)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跃进”，还是使得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还是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贫穷”等问题，中共建国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本书此处只想强调两点：第一，正是由于坚持以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理想中的中国人民，就不再是一个由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构成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而只能是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第二，因而其

在处理当代中国社会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时所奉行的基本政治原则，也就不再是同一异质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合作为要，而只能是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阶级斗争为纲。

第五章 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影响（三）

..... (95)

所谓“团结”，不过是彻底瓦解“四个朋友”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平等独立、合作互利的政治关系，以期所有的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经由彻底地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乃至思想观念，而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则不过是用来谋取此种“团结”的半强制性政治手段，无非一个朋友在“消灭”其他三个朋友的时候，允许被“消灭”的对象就其自身如何被“消灭”的具体时间与具体方式，向消灭者提提“意见”而已。如此这般，也就是毛泽东始自“三大改造”所宣称的“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毫无疑问，倘若经过此种政治蜕变之后的“团结——批评——团结”依然称得上是政治民主，那么这就真的不能是什么“旧民主”，也不能是什么“新民主”，而只能是人类政治史

上“最新式”的民主了。

**第六章 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及其
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影响（四）**

..... (116)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因而所以要解决这两种矛盾的政治目的也都是共同的，那就是促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向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转变。而要完成这种转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所谓“善转”，所谓“和平的转”，即是指对被转对象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以促成其转。所谓“恶转”，所谓“强力的转”，则是指对被转对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其转。如果被转对象果然心悦诚服地接受“团结——批评——团结”的主张，那就说明“他们”与“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善转”，可以“和平的转”。倘若被转对象居然不听“团结——批评——团结”的主张，自己不愿意“善转”，不愿意“和平的转”，那就说明“他们”与“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也就只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好迫使

他们“恶转”，只好迫使他们“强力的转”了。

第三篇 邓小平与异质性社会共同体

第七章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意义（一）

..... (141)

毛泽东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当然不可能接受邓小平先是“纲”“目”并提，继而以“目”代“纲”之举。他随即发动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愤然作辞：“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然而，尽管毛泽东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的（政治）生命毕竟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所发动的“批邓”运动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而邓小平却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起落中，以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动摇了毛泽东旧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目”的纲目模式，从而揭开了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历史性转换的序幕。毫无疑问，邓小平对于“四人帮”是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好感的。邓小平之所以要全力扭转中共“十一大”所制定的“抓纲治国”的政治决策，决不是因为他对于“四人帮”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政治上的保留，也不仅仅是因

为他希望国家能够尽早摆脱历史旧账的纠缠以多赢得几年建设现代化的时间，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因为他希望借此举彻底瓦解“抓纲治国”背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目”的陈旧纲目模式，从而彻底完成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由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邓小平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第八章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意义（二）

..... (159)

尽管邓小平在“六四风波”之后反反复复地告诫人们“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凡改变这个方针政策的人，“谁改变谁垮台”，但是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他们打着“反右”的旗号对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既定政治路线实施左的干扰，“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一时间竟造成“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严重政治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

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九章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意义（三）
..... (180)

经邓小平二十余年的顽强努力，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终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并且从此不可逆转。那么此一中心的最终确立，对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又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重意义，所谓不再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